

“艺匠之节度”。“何谓‘四务’？运意、定格、结篇、炼句也。意者诗之神气，贵圆融而忌暗滞。格者诗之志向，贵高古而忌芜乱。篇者诗之体质，贵贯通而忌支离。句者诗之肢骸，贵委曲而忌直率。”用圆融、高古、贯通、委曲来调节意、格、篇、句，为建构古雅型诗歌意象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。

总之，王廷相有关诗歌意象的本体论、特征论、方法论，是他从“气学”思想向美学思想转化的结果，是哲学上的唯物辩证法向美学上的辩证法转化的结果。由此可见，王廷相有关诗歌意象的本体论、特征论、方法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到艺术哲学（美学）的高度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其内涵之丰富、见解之深刻、理论之系统，不仅在嘉靖前期将逐渐转化中的诗歌主张提升到艺术哲学（美学）的高度，呈现出异峰突起之势，而且在有明一代的意象理论中也是首屈一指的，同时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也闪烁着理论的光辉，至今还值得人们进一步发掘与弘扬。

〔作者简介〕陈书录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明代诗文的演变》等。

•读者•作者•编者•

《苏轼〈浪淘沙·探春〉编年补正》之补正

《文学遗产》2008年第3期刊有胡建升先生《苏轼〈浪淘沙·探春〉编年补正》一文，指出词中“昨日出东城”之“东城”非杭州之东城乃黄州之东城，故此词不应作于杭州而当作于黄州，进而论证该词当作于苏轼居黄州的元丰五年正月二十一日。胡文看似有理，其实难凭。

胡文云：“苏轼倅杭时，寓居于城南的凤凰山，其游西湖则出西门，游钱塘江则出东门，而词中无一字提到钱塘江，也没有西湖景物的痕迹，词中‘东城’似非出杭州之东城。”此中推理欠说服力：第一，游钱塘江要出东城，但出东城并非一定是去游钱塘江；第二，并不能因为词中“无一字提到钱塘江”，就判断此词定非游钱塘江之作。胡文又云：“根据苏轼熙宁六年（1073）正月所作《正月二十一日病后，述古邀往城外寻春》，以及其友人陈襄同时所作《和苏子瞻通判在告中闻余出郊以诗见寄》，可知苏轼、陈襄等人所游的乃是西湖，也说明此次春游不是从东门出去的。总之，此词系为熙宁五年或六年都是不可靠的。”胡先生此处推理有问题，据上述两诗确可证明苏轼和友人陈襄的那次春游是游西湖，照常理游西湖肯定不从东门出，这和原词中所记的那次“昨日出东城”之游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总不能因为熙宁六年正月苏轼有西湖之游就判定他熙宁五年、六年这两年的春天不可能再有“出东城”之游吧？

胡文论证苏词不作于杭州后，又据词中有“东城”一词，而苏轼贬黄期间诗文中有几处用到“东城”、“东门”，故推断该词作于黄州，这是胡文的新发明。但有明显解读之误。

第一，“东城”并非“东门”。东城通常当指东边的城区，有时也可指东边的城门即东门。《浪淘沙·探春》词中“昨日出东城”之“东城”作东城区或东城门理解都可以。胡文例举，无法证明“东城”乃特指“东门”。第二，此“东城”并非彼“东城”。此处应特指黄州城东的“女王城”。据苏轼《记黄州故吴国》文云：“昨日读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，黄州乃永安郡。今黄州东十五里有永安城，而俗谓之‘女王城’。”（《苏轼文集》卷六六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074页）王十朋《东坡诗集注》卷三《正月二十日往岐亭，郡人潘、古、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》题下注云：“十朋先生志林云：‘黄州东十五里，有永安城，俗谓之女王城。’”（四库全书本）《苏轼诗集》卷二一同题诗下亦引查慎行注云：“《名胜志》：去黄州十里有永安城，俗谓之女王城。”由上可见，苏轼居黄州期间经常出游的“东城”，并非黄州之东城区，更不是如胡文所说的黄州之“东门”，乃特指黄州城东十余里处的古城“女王城”。

由此可见，胡文之新考订是不成立的。细味《浪淘沙·探春》一词之内容和意境，愚以为其编年还是以王文诰熙宁五年之说为佳。

吉首大学 杨松翼